

打心里认同积分制方案,并且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。三是积分制经费来源单一。打安镇以两个村做试点,实施过程中,由于经费紧张,预算来源有限,经费的申请和落实存在一定困难,急需拓宽资金来源渠道。四是积分制结果运用仍需进一步拓展。打安镇的积分制结果应用还难以让村民从内心认可自治的效果,积分制管理实施的成效不足,无法充分发挥积分制的“小积分撬动大梦想”的杠杆作用。

实施积分制面临的挑战

从全国范围实施的经验并结合打安镇现实来看,实施积分制仍然面临着不小的挑战。

积分规则设计难题。打安镇共8个村委会、2个居委会、1个镇农场、60个居民及村民小组和31个垦区居民点,居民涵盖黎族和汉族,情况较为复杂,积分制较难结合所有情况来设计出符合所有村民意愿的积分规则。

户均积分差距容易引发抵触情绪。由于户与户之间存在家庭人数、身体状况、社会资本、年龄结构等较大差异,积分的累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“马太效应”,部分农户的分数越来越多,大部分农户的积分增加进入瓶颈阶段。如此可能使得分数累积少的村民积极性受挫,导致积分制变形走样,甚至部分农户直接退出积分制规则。

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难题。由于地理位置限制,打安镇产业主要以种植业为主,经济发展受制于资源劣势,低端农业只能依赖土地和劳动力,尤其是集体经济发展存在困难,以至于“爱心超市”所持有的款项难以支撑运营成本,无法保证持续性积分兑换。同时社会资

金和银行融资渠道尚不畅通,物质基础薄弱,给积分制的长久持续运行带来阻碍。

道德量化与奖惩引发质疑。积分制是基于治理机制下乡村基层创设的正式规则,但是正式规则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村民的私人生活范畴,也会面临诸多伦理层面的质疑。打安镇由黎族和汉族两个民族构成,下辖43个自然村,包括子雅、可程、合水等革命老村,民风淳朴,群众务实勤劳,上敬老人、下育子女在村民看来是“天经地义”的事情,如果将优良的品格量化考核,可能会引发村民对道德可否以及能否被量化等产生疑惑。

创新海南积分制管理的理念和思路

乡村发展归根结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,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不可能千篇一律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,“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,健全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。”为了有针对性地解决打安镇乡村治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,持续着力加大推行积分制管理力度,在探索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,笔者认为积分制应被赋予“三治融合”乡村治理体系的深刻意涵,可以通过以下多种特色理念和实践形态创新运用。

一是德治为先,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道德伦理是自治与法治的实质内容和精神内核,德治为先不仅意味着在乡村社会生活中,情、理、法高度相融,而且其追求乡村善治,个人、家庭和村庄几个层面的秩序塑造,需要遵循更高标准的地方性道德“共识”。积分制治理的原理是面向乡村生活,在

法律法规所不及之处确立一套绵密而长效的规则体系。如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永昌镇“永昌风尚榜”等,筹建“道德银行”,设立善行义举榜、道德星级榜、道德红黑榜等,能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其中,润物无声。打安镇的子雅、可程等革命老村,民风淳朴,群众务实勤劳,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强,因此对于道德败坏的行为应加大扣分力度。

二是民族团结,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基于打安镇“汉族+黎族”的现实,突出协调不同民族风尚和民族习俗的积分制特色。由于大多数村民对村务政务参与性较低,少数村民民族意识淡薄,在创新积分制推行过程中,应在寻找两个民族认同点上设计积分制项目,突出民族融合,以扩大积分制的民族要素实施范围,实现少数民族的有效乡村治理。在乡村治理中更应该在尊重和传承优良民族风俗上下功夫,关切村民基本的生存发展需要,如环境卫生、邻里关系、村民政治参与等方面,通过民族文化的积分治理模式,鼓励村民主动参与,从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。在突出民族特色的同时也要关注不同村镇的村情特色,打安镇村与村之间存在差异和联系,因此不同村户之间积分项目应该进行相应调整,探索“积分制+N”模式,将积分制工作与当地各村委会的重点工作相结合,例如与乡村振兴、人居环境、创业致富等主题相连接,由基层组织结合当地各村委会特色来具体调整积分项目。

三是凝聚力量,多方扩大积分制的资金来源渠道。提供以公共产品和服务为核心的乡村社会工作,探索以市场为中心的积分制运